

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

张清敏 罗 列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从最初的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外交始终围绕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一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安全来保卫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制于外部局势的影响,服务于对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布局上集中于“三线”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相继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国内工作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外交的任务就是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执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外交政策。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就是服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 中美建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罗列: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历史走向问题,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概念和鲜明主题。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①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②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重要途径。

鉴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学界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内涵和经验、影响和意义,但对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却鲜有探讨。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都是粗线条、间接和零散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意识不强、历史主线不清、与现实结合不紧、缺乏系统性、学理化阐释不够等局限。因此,亟需加大对二者历史与现状、关系与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力度、广度和深度,整体把握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进程的关系,加深对中国外交历史演变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关系的理论认识,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为此,本文基于中国领导人关于外交与现代化相关重要论述,梳理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依存共进关系和迭变演化历程,深化对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途径。

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和鲜明线索,国家兴衰沉浮、民族盛衰荣枯,都与现代化的能力水平和进展程度紧密相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当崎岖,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学习模仿西方现代化的阶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现代化的两个阶段。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1页。

(一) 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现代化”即“modernization”一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最先使用的,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名词,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①“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另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②现代化虽然产生于西方的历史语境,但其所描述的现象或内容则是世界历史演化进程中的普遍客观实在。^③现代化产生以后,逐步由以西方为中心向世界各地扩散,各地区、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

目前,学术界没有对现代化的定义取得共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C. E. 布莱克提出,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现代化意味着“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④曾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和……“一种目标”,^⑤或者“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也就是文明本身的出现”。^⑥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认识现代化,“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指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

① 所谓“……化”(英语-lization),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既可理解为“变成……”,也可解释为“像……一样”或“类似……”。比如说“近代化”指的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结构由传统变成近代,“中国化”指的是西方的理论与现实经由实践变成中国的理论与现实;“欧化”指的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像欧洲人一样,而不是真正变成欧洲人,同理,“西化”也可作如此理解。参见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第191页相关注释。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③ 对于现代化的起源,学界目前没有定论,说法不一,主要包括新航路开辟说、文艺复兴运动说、宗教改革推动说、科学革命说、启蒙运动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说、工业革命说等。

④ 〔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⑤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程”，“狭义而言，是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改造经济技术和对世界先进的学习，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对该概念的界定反映了学界在现代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现代化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探寻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目标是一个不断探索、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研究和探索，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历程相当崎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在19世纪中叶遭西方入侵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民办企业，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④这种单纯追求器物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围绕政治改良还是政治革命，近代中国开始了制度现代化的实践。但是，推行“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⑤走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这些现代化探索终究以惨败收场。由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⑥

到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爆发了一场“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最为集中的争论是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⑦这个特辑刊出了26篇讨论中国现代化出路的文章，集中围绕经济方面的“现代化”问题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⑤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⑦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进行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①这些讨论在总体上体现了思想界有识之士对中国现代化现状、进路和意义的积极思考,对增强国人对现代化的关注和重视无疑是有一定帮助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1931年,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中国现代化”一词。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③从而向全党提出了为实现中国工业化而奋斗的重大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具备了“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应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业和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现代化”一词来概括中国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渴望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近代化”与“现代化”经常交替使用,甚至相互混用,1949年,现代化逐渐取代近代化成为中国领导人常用的政治表达,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探索不断推进。

(三)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搞什么样的现代化、怎么样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现实和可能的任务,但是,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全方位现代化等不断深化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拓展和加深。

^①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转引自顾海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及其思想史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2期,第14页。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这个时期对现代化的认识就是工业化。1953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①1953年12月,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一化三改”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基本任务,另一方面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②并“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③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展开,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拓宽,现代化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1954年9月,毛泽东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④周恩来在对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从“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具备的条件出发,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否则,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公开提出。周恩来坚定地预言:“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⑤

在这个过程中,“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经历了变化。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⑥“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⑦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强调集中力量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纲领。^⑧中共八大确立的党章总纲明确,“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

①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第1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⑧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

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后来被归到工业现代化里面,因为考虑到工业应该包括交通运输业,而且交通运输业在工业化过程中是要先行的。1957年2月至3月期间,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告,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增加科学文化现代化(后又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对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对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视,因此,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③

国防现代化先被移出现代化的内容,后又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将其纳入其中。面对世界形势向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周恩来提出要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在之后几年时间里,也暂时不提国防现代化,只提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到1959年,毛泽东提出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59年,毛泽东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④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⑤

此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逐渐清晰,并在党和国家的会议或文件中得到明确表达。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了“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周恩来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⑥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① 共产党员网: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https://www.12371.cn/2012/10/25/ART11351156898801133.shtml>,2024-12-05。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④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3页。另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923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号召。^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近30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启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对现代化的认识有过一个逐步深入和具体的过程。这一时期的现代化之路充满坎坷。但是,在“四个现代化”目标引领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艰难探索过程中坚守住了社会主义方向,基本保持了延续发展的前进态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年)期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举全国之力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来,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②中国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一穷二白”的局面,培养和积累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及其工作经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新时期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取得的“两弹一星”是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因为“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③“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④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外交

不仅现代化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启现代化建设,但国内外形势却没有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来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② 李正华、宋月红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3年版,第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一）维护主权和安全与现代化建设

在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工业十分落后，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因此，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快速实现工业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后的理想状态和现实追求。但是，新生的政权处于被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严密封锁、遏制和威胁之下，新政权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问题。受制于严峻的外部安全局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得不屈从于，甚至服务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对外战略。

在国内确立了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其中，“另起炉灶”就是切断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建立新的外交队伍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是为了清除西方列强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再请客”，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促进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工业化或者后来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面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敌视、战略上“遏制”，外交上不承认且阻止其他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严密封锁。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插手中国台湾问题，加大对法国恢复印度支那殖民统治战争的支持，在东北、东南和南部对新中国构成巨大安全威胁，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在东北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南部支持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在东南打击美国借口朝鲜战争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粗暴无礼干涉。

“一边倒”就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寻求安全上的保障，而且获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帮助。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实施。这一政策使得新中国有一个可靠的战略同盟，也使新中国在西方封锁遏制的恶劣环境中获得了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有效打破了美国对华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根据同时签署的《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给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这笔贷款在我国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经过“一五”计划的建设，中苏签订了数百个合同、协定，苏联向中国派出大批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1953年5月,苏联承诺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来华工作,帮助中国工业化建设。1954年10月,中苏再次签署10项合作协议。^①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重要项目总共达到156项,对我国的国防安全、产业布局、地区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②

经过“一五”计划的建设,我国农业、工业实现年均增长4.5%、18%,轻工业、重工业年均增长12.9%、25.4%,建成了一大批重大项目,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③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8%,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至1957年的56.5%。^④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改变了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为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反帝反修”与三线建设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两党在国际战略上认识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的辩论导致两国关系趋于紧张。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之间的合同和协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重要设备及其零部件供应直至1962年发展为边界问题上的直接军事冲突。虽然现代化的目标仍然突出,但是,中国不得不在外交上将美国看作最大的安全威胁,同时也把苏联作为重要的威胁因素,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要从最坏处着想,为此把整军备战提到重要地位。

外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对外战略的同时,也不得不调整国内经济发展布局。进入1964年,美国干涉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升级到1965年直接派兵参战,并不断侵入中国领空、领海,在中越边境接壤地区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严重威胁中国的领土安全。中印关系从1959年开始恶化,最终发展到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经济困难之机,加紧策划“反攻大陆”。随着国家安全压力不断增大,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注意国际局势的发展,准备打仗,在长远规划中首先要搞好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要求“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

① 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30页。

②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93—107页;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549页。

③ 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④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06页。

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①将沿海地区的优势部门向内地转移,将工业、科技、国防等生产资源向“三线”^②地区调整,东部和中苏边境为一线,中部大部为二线,西南地区为三线,沿海的一些工业向内地迁移。既要“在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丝毫也不可以放松对战争的警惕。要在随时准备打仗中搞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随时准备打仗”,^③这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真实写照。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思想,这个时期的“三线建设”按照“山、散、洞”的方针,大力开发建设战备工程,“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地建设起来,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④

为了维护国内的安全,三线地区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布局的重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 “一条线,一大片”与三线建设

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任务没有丝毫动摇,却始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不可自拔的机会,不断扩充庞大的军事力量,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至1969年,苏联在中国边境制造了珍宝岛冲突等一系列事件,并扬言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中国领导人根据美苏力量对比及其对华政策的变化,改变外交被动和不利局面,中国主动对“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积极推动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经过长时间沟通酝酿和拉锯谈判,中美通过“乒乓外交”,实现“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奇迹。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访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两国同意结束长达22年的对峙隔绝状态,双方共同表示要为发展两国间的科学、技术、

① 洛平汉、何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6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7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322页。

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以及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①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苏联霸权主义。^②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一大片”的构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③ 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个世界”理论，^④中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促进国际和平和发展的有力倡导者。

这个时期，中国对苏联对华发动战争的警惕始终没有放松。1974年，中共十大报告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突然发动袭击，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⑤1975年，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赶上美国的那一年，中国提出美苏争夺所造成的战争危机已经日益迫近，就像“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预兆着大战已经临近了。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报告指出，“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苏修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拿到手。^⑥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超级大国，“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危险的一个，并非决定于任何偶然的、暂时的局部的原因，而是决定于苏联形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整个历史条件”。^⑦ 197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写入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内容，而且在提到反霸的对象时，把苏联放到了美国的前面，一段时间内，霸权主义成为苏联扩张政策的代名词。

①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页。

③ 同上书，第519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⑤ 中国政府网：《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https://www.gov.cn/test/2007-08/28/content_729616.htm，2024-12-07。

⑥ 中国政府网：《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https://www.gov.cn/test/2007-08/28/content_729705.htm，2024-12-07。

⑦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第1版。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针对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严峻战争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号召“要准备打仗”。同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随后全国迅速掀起战备高潮,于1969年至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三线建设高潮。1975年11月2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要点》,谷牧在开幕式上指出:经过“三五”“四五”计划的建设,现在“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形成,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架已经搭起来了。今后10年国民经济发展,要着重搞好三件事:一是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二是建立比较强大的钢铁工业,三是充实和加强战略后方基地,把大三线建成为“硬三线”。^①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在大三线地区建立起了上千个大中型的工业企业,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小三线。

为应对外部威胁而展开的“三线建设”,跨越三个五年计划,历时十几年,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工业布局影响深远。到1980年,全国三线建设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1964年这些省区投资的三倍,在中西部建成了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设施和科研院所。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②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外部威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在国内开展了大大小小近30次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运动,^③打乱经济计划的落实发展。三线建设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后方基地,提升了国防防御实力,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步伐做出了极大贡献,促进了西部地区交通以及城市化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工业建设的一个经济奇迹和空前壮举,但对中国经济布局 and 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确立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但恶劣的外部环境导致中国无法把国内工作的重心放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执行的“一边倒”“反帝反修”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是对这些时期恶劣外部环境的反应。从过后来看,这些政策既是为了维护领土主权,保卫国内经济建设,也影响了不同时期国内政治格局和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数次国内政治运动,以及按照“山、散、洞”原则进

①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34页。

② 李正华、宋月红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简史》,第97页。

③ 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7页。

行经济发展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对外政策在国内的反映。关于“三线”建设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大三线’建设在‘靠山、分散、进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浪费了大量资金,却难于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即使形成生产能力的企业,也是增加了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①而且“三线”建设中也出现了“铺开过急过大、选址过于强调战备、注重经济效益不够等弊病,”“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处于新科技革命兴起阶段,许多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我国处于内乱之中,丧失了宝贵的现代化建设机遇”。^②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始终面临着大国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威胁。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和迫切性,认为战争总是要来的,没有什么持久和平,但战争可以延缓。延缓战争的办法就是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搞绥靖主义,要时刻保持战备,要建设防御工程。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上升,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能力不断增强。

(一) 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中国始终认为战争即将打起来,又因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此,中国政府努力建立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加强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以此阻止战争爆发和霸权主义扩张。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认识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转变。

首先是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的分析,邓小平提出,虽然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对此仍应该有所警惕,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他通过分析各种战争因素之后提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

^① 孙尚清、陈胜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7—1980)》(3)中国的产业结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② 李正华、宋月红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简史》,第98、108页;陆莉娜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②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已经超过和平问题,成为全球的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③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和平稳定的环境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④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法的改变,为新时期外交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逻辑前提和有力的战略判断。

第二个变化是改变了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当代已经找不到哪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和服务市场,也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所有先进技术,“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⑤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⑥他指出要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⑦这就指明了实行开放就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加快速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他也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⑧这样才不会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⑨为了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1978年5—6月间,国务院派出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考察团,赴西欧考察经济情况,考察团带回来的考察结果震惊了全国,更加坚定中国领导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决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⑩全国上下逐渐形成共识,闭关自守会阻碍进步,只有进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成为共识,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④ 同上书,第116—117页。

⑤ 同上书,第90页。

⑥ 同上书,第64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页。

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69页。

⑩ 闫志民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议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明确提出要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①紧接着,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②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③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经济建设”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务的“核心”,“正式确立了新时期的外交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④也即是“明确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⑤随后,他还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⑥“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⑦“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⑧

(二) 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

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大举措,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⑨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谈道,“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⑩邓小平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4页。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⑤ 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⑦ 同上书,第194页。

⑧ 同上书,第234页。

⑨ 程中原等:《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6页。

⑩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

求立足中国的现实,确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他提出:“我们讲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因为我们必须认识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根据现在中国的薄弱基础来决定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①在此后多个场合,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建设。同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准,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③“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④

邓小平还对“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进行具体解释。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⑤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⑥邓小平十分注重现代化建设的性质问题,一直强调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在会见由蒂尔曼·德丁等19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的谈话中提出: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44页。

② 《邓小平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9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④ 同上书,第128页。

⑤ 同上书,第237页。

⑥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①邓小平尤其强调,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更加通俗的“小康”。^③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④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引领和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进行经济制裁,但中国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将工业化和市场化作为实现现代化两个缺一不可的重要条件,推动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完成了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翻两番”的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三步走”的战略。^⑤2002年党的十六大重申了“新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界定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⑥201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将第一个百年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③ 《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2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⑥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奋斗目标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始终都没有放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进一步把经济建设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和地位,强调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最大的政治。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顶层设计,^②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③ 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追求一以贯之,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时俱进,最终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地位。

四、服务于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外交

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和外部条件。但是,和平稳定的环境不是与生俱来、不会自动生成,需要党和政府主动创造、因势利导。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极推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提出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大力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广泛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此“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现代化”。^④

(一) 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

对外开放是中国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内中心工作的调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中美建交则是对外开放的关键步骤。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公布双方建交的公报,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军(撤出美国在台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废约(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两国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相互对抗了近30年的中美两国终于实现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8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②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4—1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日至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两者之间绝非偶然巧合,而是存在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启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中美建交为中国融入世界扫清了障碍,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机会,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中美建交,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不能全面落实。另外,如果中国没有决定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此而实行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就失去了主要推动力。二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

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中国领导人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目标,而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利用国外的资本和市场成为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主导地位,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经验、资本、市场,因而美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①,要获得先进科学技术,只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学习。邓小平指出,“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不对美国开放,对谁开放?”,“苏联又能给我们什么?”^② 邓小平认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③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④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和经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只有美国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自然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大规模搞经济建设,要向全球开放,没有美国这个经济强国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积蓄已久的潜能不断释放,促进中国加速融入国际市场。

邓小平重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亲自参与中美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月28日,邓小平启程赴美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希望通过这次与美国领导人的会谈,加强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96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80页。

④ 牛军:《东亚冷战视野下的中美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6页。

领域的友好合作与联系。^① 在访问过程中,邓小平与美方就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等方面进行会谈,就贸易运输、农业、能源、科技、人文交流等问题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和共识。1979年7月,中美缔结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并在1980年2月生效,美国不仅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而且还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为两国经贸往来确立了基本框架,奠定了中美经贸关系合作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1979年至1980年,中美签署了35个有关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学生交流等双边协定,中美经贸发展、人文交流不断深化。随着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开启了进入世界市场,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在沿海地区很快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建立对外开放的窗口,大力招商引资和开展对外交流,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科学技术又是实现其他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提出把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② 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人员才能大规模进入中国。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步骤,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到科技发达国家学习,可以缩短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时间,可以造就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人才。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③“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④“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⑤

1978年,中国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仅800余名;2019年,超过70万人出国深造。40多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超过650万人。1978年,回国留学人员仅248人;2019年,超过58万人学成回国。40多年来,回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20余万人。^⑥ 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6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③ 《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人民日报》2009年9月30日,第8版。

④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332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10—11版。

人,如加上港澳台地区的海外留学人员,中国的留学人员总数将超过 1000 万人。^①

从市场角度看,1952 年,中国的贸易额为 19 亿美元,1979 年增加到 206 亿美元,2008 年为 2 万亿美元,2018 年为 4.6 万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是增长最快的双边贸易,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7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 亿美元,是 1979 年建交时的 233 倍。截至 2017 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 19% 和 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 8%。^② 中国对外开放,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 121 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5 万元。若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中国在 2022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1.27 万美元,超越了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2 万美元的水平。^③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争取的资源。中国 1965 年偿还了所有外国债务,至 1976 年期间处于“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状态,也不接受外援。1978 年以后,中国开始修改国内法律,大力吸引外资,至 2018 年,中国吸引 2 万亿美元(非金融领域的)外国投资。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7 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 6.8 万家,实际投资超过 830 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增加到 2003 年的 0.65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 670 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对美国进行了大量金融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 2018 年 5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1.18 万亿美元。^④ 按美元计价,2021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6.05 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继续提升。实际使用外资 1149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中国连续 4 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2020 年成为对外

① 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327,2024-12-0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5 日,第 10—13 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 日,第 9 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5 日,第 10—13 版。

直接投资流量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①

中美双方从经贸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等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开放市场,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外部市场。美国在华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市场竞争,提升了行业效率,带动了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机电产品和农产品,弥补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满足了各领域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丰富了消费者选择。^② 根据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22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7594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高达5818亿美元,从美进口1776亿美元。^③ 2022年,中国实际利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其中,中国实际利用美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221亿美元。^④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努力融入世界体系,实现了从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逐步转型成为一个世界级贸易大国的历史性跨越。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956.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资13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外资企业总数占中国企业总数的2%,但贡献了22.5%的工业产值,28.3%的工业利润,16%的税收,38.7%的外贸,20.7%的研发投入。外企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贡献率在20%—34%之间,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外企贡献率更大。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8万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资企业向东道国年均缴纳各种税费超500亿美元,拉动当地就业近250万人。^⑤ 根据《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1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851.5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⑥

① 《外企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人民日报》2022年1月28日,第3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8年9月25日,第10—13版。

③ 海关总署:《2022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4807727/index.html>, 2024-12-10。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024-12-10。

⑤ 《以扩大双向投资唱响开放和音》,《人民日报》2023年9月11日,第10版。

⑥ 《中国推动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成功结束文本谈判》,《人民日报》2023年7月9日,第3版。

改革开放对中国形成一种正向的刺激和压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获取必要资源和市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① 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②

(二) 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外交政策

随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外交政策相应进行了调整,明确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后不久,因为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引发中美建交后双边关系的第一次危机。1982 年 8 月,中美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在公报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确与美国拉开距离,与苏联松动关系的政策。一个月后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③ 同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④

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改变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国搞潜在的“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政策,不再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更不把反对苏联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国就推动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1982 年 10 月,中苏开始了第一轮磋商,1984 年至 1985 年,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经贸合作协议,使得两国贸易额逐渐增长,技术合作日益密切,最终推动双边关系在 1989 年 5 月实现了正常化的目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

① 吴忠民:《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7 期,第 28 页。

②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8 日,第 2—3 版。

③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1982 年 9 月 8 日,第 1 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5 日,第 1 版。

言权。”^①

随着中国与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不再以苏划线,既不以社会制度,也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论亲疏好恶,而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不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三尊重”的方针:尊重它们根据本国情况确定的内外政策;尊重它们同苏联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尊重它们发展同中国关系的设想和做法。^②对非洲国家关系尊重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对拉丁美洲遵循“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这些都强调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显示了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些新特点。这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在同美苏打交道时处于更加灵活的地位,服务和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和拓展。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压,进行经济制裁,中断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国政府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冷静观察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了确保和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积极有为,不仅打破了西方的制裁,而且还与韩国、以色列、沙特、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到20世纪结束的时期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国策,经过漫长的谈判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至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从2436亿美元增至21358亿美元,年均增长13.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进口额从393亿美元增至5250亿美元,年均增长16.5%,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9.4%。^③对外贸易逐年增长,从1978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累计达到52.19211万亿美元;2018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达到2.4867万亿美元、2668亿美元。1978年至2018年,中国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②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1—13版。

资 2.0343 万亿美元,累计设立近 100 万家外商投资企业。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30.4 亿美元,是 2002 年的 53 倍,年均增长 28.2%。近年来,中国连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2018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近 1.5 亿人次。^① 中国已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2023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1633 亿美元,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772.9 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 11.4%,连续 12 年居全球前三。^②

经过新中国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基本走完了西方国家长达两百多年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历程,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效的“时空压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国内工作的中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明确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确立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国策的同时,实现了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也带动了中国同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深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条件,很好地服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拓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和平方式、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的现代化。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面临着一个又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安全,新中国被迫卷入一次次的外部冲突,包括反对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第 11—13 版。

^② 《引领开放合作潮流的中坚力量》,《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7 日,第 1 版。

美国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援越抗法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威胁我国安全的援越抗美,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反对苏联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破坏领土完整的边界冲突,以及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但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卷入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就减少了战争对经济的大量消耗,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

除了不断介入军事冲突外,为了维护安全,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处于应急状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点置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上,例如,“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①对战争可能性降低的判断,既是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和依据,也促使政府减少对军事的预算和投入,将更多精力和资金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②

国防建设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建设的大局,国家决定终止服务于准备战争的“三线建设”。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中国部分产业和厂矿企业开始从内地三线地区向东部沿海城市的转移。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三线办公室名称几经调整和地位逐渐下降,从侧面说明了三线地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逐渐减弱、作用逐渐降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

服务经济建设的另一个举措是下决心裁减军队人数,把军队人数规模调整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1982年,中央军委提出“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原则,军队采取了精兵简政。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做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的决定。按照中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

② 同上书,第128—129页。

1985年的423.8万人减到323.5万人,1990年减少到319.5万人。冷战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再次经历几次大的缩减,至今只有223万人,并且保持稳定,军队人数和国防费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速度相适应,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担和压力。

中国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把大批军工企业、军用机场、港口、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中国还大力削减国防开支,国防开支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1978年,中国的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63%,1979年最高达到5.43%,从1980年开始下降为4.29%,1983年为2.98%,1986年为1.97%,1988年为1.46%。^①随后,中国国防开支经历了从维持性投入适度增长的发展历程,总体保持与国家经济和财政支出同步适度协调增长,至2017年为1.26%,近30年一直保持在2%以内。1979年,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17.37%,1983年为12.57%,随后,一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10%以内,2017年为5.14%,下降超过12个百分点,总体下降趋势明显。^②

在中国大量减少军费开支、军队人数的同时,中国外部环境却不断得到改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逐渐降低,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使中国政府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几十美元增至2020年的超过1万美元,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0年的3.2189万元。^③

科技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大桥巍峨,天涯成咫尺,天堑变通途。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攀升,各个领域的人才不断涌现。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持续向中高端迈进,逐步实现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随着现代化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1998年7月28日,第1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人民日报》2019年7月25日,第17—19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第10—12版。

设,人民群众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时提出新时期中国外交要以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没有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不是建立在对外侵略、掠夺、殖民而是根据中国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在外交上,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就是以和平方式开辟新型现代化道路。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目标和中国外交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判断,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新征程。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就是实现更高水平和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两步走的战略中,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规划到2035年的发展总体目标时,报告还提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的目标。^③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再次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但国际形势今非昔比。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来自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9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大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第3页。

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① 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仍然明确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外交则需要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光荣使命就是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③“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④ 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⑤在对外工作中尽最大努力减少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⑥ 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有作为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同步展开的历史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稳定的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⑦ 在外交上重视和处理好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的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所带来的挑战,要“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⑧坚定有力地维护中国的制度、领土主权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2页。

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第12—13页。

③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人民日报》2024年8月13日,第6版。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⑤ 同上书,第18页。

⑥ 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年第15期,第3—6页。

⑦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11日,第1版。

⑧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3月7日,第1版。

等核心利益;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发展中美关系,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争取实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结 语

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密不可分,中国外交的创新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和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离不开中国外交的跟进和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走过百年探索历程,这个过程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拓展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上,做出了调整工作重心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新时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获得新的动力和机遇。对外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同世界各国的开放对接和友好合作,世界好,国际环境和平稳定,中国才能发展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同样,中国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世界才能发展更好,持续为世界提供一个又一个重大性机遇。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必然选择。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服务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反过来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从近代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继承过去辉煌的历史,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求大力推进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在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变局中奋力开创中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24

Vol.45 No.6

ARTICLES

The Role of Diplomacy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ng Qingmin and Luo Lie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trodden through a long way in its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initial industrialization to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from Chinese-style four modernizations to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China's diplomacy has centered on the task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was to safeguard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 as to defend and protect domestic modernizat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ina's modernization had to subordinate to it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prioritizing heavy industries which were mainly laid-out in the Third Line regions. After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s," shifting the focus of the country's domestic polic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was to create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dome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 this purpose, China normaliz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rsued an omni-directional foreign policy featuring non-alignment and independe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through peaceful development offers a new op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is determined 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help achieve such goals.

America's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 Historical View

Cai Hong (40)

Illegal immigration has had strong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its inception,. Historically the U. S.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adopte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deal with illegal immigration. However, these